

台灣近代文明史的另類書寫

——從年鑑學派的史學方法來談《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》的書寫

作者：許利彰

書名：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

作者：陳柔縉

出版社：麥田出版

出版日期：2005年七月

本書摘述：

陳柔縉女士的《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》一書，是從不同於過去的國民黨史觀出發，透過九大部分（如：飲食、日常生活、社會生活、公共事物、教育……等）、四十三個主題（如：電燈、電話、法院、公園、監獄、圖書館、西服、牙刷牙膏……等），搜羅史料，旁徵博引，利用大量的口述歷史、回憶錄、日記、訪談錄、報紙報導、電話簿、廣告、傳單、官方調查報告以及大量的圖片資料中，追本溯源、用心考證，以平均兩千五百字左右的篇幅，簡單扼要、俐落流暢的將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生活的面貌，台灣現代化的歷史進程，一一重現在你我的眼前。

正如作者在其自序中所說的：「本書可以說是台灣近代文明史的另一種書寫，四十三個主題雖然不能涵蓋一切，卻已能道盡五六。……我並不是很

主張用『生活史』的概念來點出這本書的主題。生活史的概念過大，我並沒有重現農村食衣住行的傳統生活風貌，或者早期台灣人都怎麼過端午、如何普渡，我著意的是那些近代西方文明事物如何進入台灣社會，引發生活與見識的轉變。」

也因此，本書沒有政治制度的介紹、軍事戰略的描寫、經濟措施的說明；有的只是台灣第一家咖啡店的由來、台灣第一家百貨公司的起源，以及台灣人如何開始過耶誕節。整本書讀來輕鬆愉快，讓人意猶未盡，讓讀者可以在一篇篇的文章當中，找到爺爺、奶奶當年的成長痕跡。

心得評論：

筆者試圖從年鑑學派的歷史研究方法，對陳柔縉女士的這一本書進行三個面向的討論。首先是分析作者的歷史觀念與寫作方式；其次是討論作者的史料態度與取材對象；最後則是針對本書所介紹的主題，提出可以深入討論的議題與研究內涵。

1929年，任教於法國斯特拉思堡大學的史學家馬克·布洛赫（Marc Bloch）與費夫爾（Lucien Febvre）共同創刊《經濟社會史年鑑》，他們將

歷史研究的範圍擴大，融入地理學、社會學、經濟學、人類學、醫療史、心態史……等不同領域的研究面向，企圖勾勒一個「總體的歷史」。而圍繞著這本雜誌所形成的這一種新的史學研究方式，就被稱為「年鑑學派」。

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在其《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》一書中，對於年鑑學派有簡單扼要的介紹，他說：

「年鑑學派大體可以分成三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，從 20 年代末創辦雜誌，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。這一階段可以看成是年鑑學派對舊史學的挑戰時代，他們的主要工作和口號，是對傳統的政治史為中心的歷史學傳統進行挑戰，……就是把研究重心從上層的、中心的、精英的政治史、經濟史、大事件、大人物，轉到社會生活、環境、經濟這些看起來很形而下的、普通的東西。

第二階段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到 60 年代革命的時期，也就是 1968 年以後，這個時期是年鑑學派最輝煌而且是形成學派的時期。以布羅代爾為中心……大規模描述環境，包括地理、植被、食品等生活的各個方面。

第三個階段大體從 1968 年開始，是年鑑學派的分化、變異與迴歸時代。……年鑑學派重心逐漸從社會經濟轉向社會文化，又出現了一個新趨勢，……這是第三階段。目前，心理史、心態史，包括精神史這些研究角度

在那裡仍然很流行。」

無論是第一階段的社會生活，第二階段的社會環境，還是第三階段的社會文化，可以發現，年鑑學派將歷史從政治史轉向到社會史，並將研究領域擴大到社會各個層面，也將研究範圍縮小到私人生活。

而筆者認為，本書的寫作，在某部分的確實踐了年鑑學派的歷史研究方法。

端看作者在本書中所羅列的九大部分、四十三個主題，我們就可以了解，作者對於歷史的取材角度與寫作方向，與過去台灣史的書寫方式有很大的差異。

在本書中，作者不討論人物、不討論政治、不討論戰爭；作者介紹足球、介紹飛機、介紹畢業典禮。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，作者的歷史，是由具體的物件（彈鋼琴、刷牙）、日常的習慣（上廁所、開始運動）、生活的形態（逛百貨公司、過聖誕節）所形構而成的時代特徵與潮流風情。

陳柔縉女士在其自序中曾說：「本書可以說是台灣近代文明史的另一種書寫，四十三個主題雖然不能涵蓋一切，卻已能道盡五六。……我並不是很主張用『生活史』的概念來點出這本書的主題。生活史的概念過大，我並沒有重現農村食衣住行的傳統生活風貌，或者早期台灣人都怎麼過端午、如何普渡，我著意的是那些近代西方文明事物如何進入台灣社會，引發生活與見識的轉變。」

從陳柔縉女士的自序來看，本書的主要目的，是介紹台灣在日治時期如何進入現代化國家的文明歷程。而筆者認為，從年鑑學派的歷史研究方法來看陳柔縉女士的《西方文明初體驗》，確實可以讓我們跳脫國民黨政府在過去所形塑的帝王將相、侵略戰爭、殖民統治、抗日屠殺的舊史觀，重新理解台灣從 1895~1945 這五十年的日治時期，在社會文化、思想觀念、生活型態上的變遷，這也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說：「是歷史事實，就是歷史事實，沒什麼好選擇講或不講的。日本時代的歷史並不僅屬於日本人，台灣人也在其中，更沒有必要避而不談。」

除了書寫歷史的切入點不同之外，本書的另一個特點，即是歷史材料的運用。

嚴格來說，歷史就是「有可能是這樣子的過去」。史學家針對有限的史料，進行客觀嚴謹的推論，進而重構「可能的過去」，即是我們所謂的歷史。我們只能在當下做出最接近事實真相的假設，盡可能的將所謂的「歷史真實」重現在我們眼前。

那麼，我們如何在有限的史料當中去還原比較接近歷史真相的事實，而不是透過想像去詮釋自以為是的故事呢？或許，關鍵在於史料的搜集與判斷。如何能擴大史料的範圍，提出更具有說服力的證據，拼湊出最貼近真相的歷史敘述，其實是對史學家的考驗。

被稱為年鑑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法國歷史學者雅各·樂高夫（Jacques Le Goff）就曾在其《年鑑學派與史家》一文中，指出年鑑學派的特點，在於年鑑學派擴大了歷史文獻的範圍，使得歷史不再局限於政治和經濟的大事，不再囿於正史、檔案等官方文獻，並以更多元的史料取而代之，擴大了史學研究的可能。於是我們發現，年鑑學派的歷史學家在書寫歷史所運用的史料範圍非常廣泛，他們使用建築的樣式、牆壁上的圖案、雕塑繪畫、不為人知的檔案、口供、書信、日記、帳單、收據、筆錄、貨物清

單……等等各樣各樣的材料，從中描繪出一幅幅歷史的圖像。

從史料取材的角度來探討陳柔縉女士的《西方文明初體驗》，筆者認為，作者對於史料的取材與書寫的內容，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了年鑑學派的歷史研究方式。

記者出身的陳柔縉女士，在資料的取材、蒐集、處理與運用上，均展現出不同於專業史學家的眼光，放寬了歷史的視野，我們可以從本書的附錄中發現，作者從大量的口述歷史、回憶錄、日記、訪談錄、報紙報導、電話簿、廣告、傳單、官方調查報告以及大量的圖片資料中，追本溯源、用心考證，以平均兩千五百字左右的篇幅，一篇接著一篇，俐落流暢的還原了台灣受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生活，勾勒了台灣近代發展的文明歷程。

筆者並不清楚作者是否曾經學習過年鑑學派的歷史研究方法，然而，或許陳柔縉女士的記者背景，讓她在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過程中，對於什麼可以成為歷史書寫的資料，有超乎常人的敏銳，也擴大了歷史書寫的可能，不知不覺中成就了一本台灣近代文明史的經典作品。

從本書所具備的兩大特點（另類角度的歷史書寫與別開蹊徑的取材範圍）出發再更進一步的深入討論，筆者認為，或許我們有機會可以探索台灣史學研究尚未開墾的荒地——台灣近代思想史。

筆者認為，年鑑學派的歷史研究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意義，即是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種研究對象的轉化，讓思想史不再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學說，讓思想史研究者可以將眼光放大，進而討論思想的發生與自然環境、社會生活、風俗文化、經濟行為與民間信仰之間的交互影響；也讓思想史研究者的眼光聚焦，從一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當中，尋找思想脈絡與時代思潮。

筆者認為，要討論台灣的現代化或近代化，關鍵絕對不只是在使用器物的改變，而是思想觀念上的整體更新。

就以鐘錶的使用來當做例子吧！陳柔縉女士在本書的第二部分（日常生活用品）中，介紹了鐘錶在台灣的引進、流傳與使用的進程。然而，筆者比較在意的是，鐘錶的引進與使用，是否具有台灣近代思想史上的現代化意義。

從資料上來看，1601年，利瑪竇就已經呈獻鐘錶給當時的康熙皇帝，然而，我們並不會認為當時的中國，已經進入了現代化。原因在於，鐘錶在當時，只是新奇好玩的裝飾器物，沒有任何時間觀念上改變的意義。

然而，來到了日治時期，情況出現了變化。如果正如作者所言：「時代進入日治之後，鐘錶之於台灣社會最大的變化是日漸普遍。」那麼，是否也可以表示，台灣進入日治之後，在時間掌握的觀念上，已經開始出現了轉變呢？

筆者以為，鐘錶所代表的意義，在於守時觀念上的改變。讓原本含混籠統的時間觀念轉化為要求時間的精細準確。將鐘錶作為計時工具，並且產生了以分鐘作為守時的計算單位，才算是現代化。

那麼，這種要求精細準確的觀念，是如何形成的呢？筆者認為，鐵路的建置或許是一個原因。

哈佛大學教授安德魯·戈登（Andrew Gordon）曾說：「鐵路對日本的影

響如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，不但體現在經濟上，亦在文化上。它改變人們之時間觀念、距離觀念甚至社會行為方式。……他們亦留意到火車是按時間表行駛，因此需要精確時間觀念。……鐵路時代的來臨，代表以分鐘為單位的時間以出現，不再是過去以半小時為核算單位，因此鐘錶的使用變得重要。」

從以上的敘述進而推論，筆者認為，已經進入現代化的日本，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建置鐵路系統，而隨著鐵路改變的時間觀念讓日本人開始留意守時的習慣，也因此，鐘錶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。

日本治台之後，總督府深知鋪設鐵路的重要，乃決定開闢縱貫線。公元一九一四年，從基隆到高雄的縱貫線終於全線開通。這時期，鐵路所代表的意義，就如同安德魯·戈登所說的：「它改變人們之時間觀念、距離觀念甚至社會行為方式。……鐘錶的使用變得重要。」

因此，鐘錶普遍使用在台灣近代思想史上所代表的意義，應該是守時觀念的確立以及精細準確的時間要求，而這也是現代化代表的特徵之一。

又譬如說監獄制度的設立（第四部分 公共事物），對於台灣社會文化造成怎樣的影響？當時的知識分子又是用怎樣的態度面臨牢獄之災？日本統治者又是用怎樣的方式來落實監獄的管理？我們可不可以用傅柯的理論（規訓與懲罰）去思考台灣設置監獄制度的思想轉變呢？

又譬如說百貨公司的產生（第三部分 社會生活），是否標示著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特性，早已註定與對岸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分歧呢？

以上筆者所舉的例子，只是針對本書的某些主題，做一種試探性的討論，或許想法幼稚，論證膚淺，不切實際。然而，筆者想表達的是，台灣近代文明的發展過程，不是只有在器物使用上的轉變，更重要的其實是這些文明產物所帶來的思想觀念上的衝擊，這才是現代化的關鍵。

因此，筆者認為，這一段現代化思潮的轉化過程，應該值得有更多的學者專家、文史工作者一起投入，一起發掘台灣近代化的啟蒙過程。或許，這樣的領域，應該是台灣近代思想史研究上相當有趣的一部分吧！

結語：

行文至此，筆者要做一個總結。

筆者從年鑑學派的研究方法出發，在第一部分討論了本書的寫作角度，認為本書有別於一般的台灣史，將史學研究的對象擴大，重現台灣現代化過程當中的社會生活面貌，是台灣近代史學書寫上的經典作品；第二部分討論了本書的取材對象，認為本書擴大了史料的內涵與意義，放寬了歷史的視野，提供了更可信、更多元的史料證據，反映出最接近歷史事實的真相；第三部分則提出了本書的價值，在於台灣近代思想史寫作上的啟發，如何從這些小小的物件當中去發掘台灣近代化思潮的轉變，如何從食、衣、住、行當中去捕捉歷史的皺摺，找到思想發生的根源，是值得我們再更深入思考的課題。

無論如何，本書確實展現了不同於一般台灣史的書寫方式，讓我們能以更輕鬆，更有趣的態度去認識台灣的歷史，認識我們土生土長的福爾摩沙，那段成長的故事。